

從印度外長訪問中共

看雙方關係的未來發展

沈鈞傳

中共拉攏印度旨在離間印蘇關係

印度國大黨執政期間，甘地夫人政府於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採取主動，宣佈任命資深外交官納拉揚南（K. R. Narayanan）為駐北平大使，中共隨即表示同意，並採取相應措施，使雙方幾乎全面凍結達十五之久的關係終告融解，可是由於甘地夫人多年來一直採取親蘇政策。新德里對北平的態度仍不得不異常審慎，所以雙方關係在甘地夫人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因大選失敗而垮台之前，並沒有任何突破性的發展。

自印度人民黨繼國大黨執政以來，德賽（Morarji Desai）總理所領導的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已修正了甘地夫人政府的過份依賴蘇聯的傾向，逐漸加強和美國及中共的關係。印度對外政策的轉變，正符合中共的聯合第三世界、拉攏第二世界，以打擊超級大國的全球戰略理論。這一理論不僅確認了中共在「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領導地位；而且也使中共外交政策中，對於工業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二世界」較具彈性，俾有助於利用「第二世界」的科學技術來推動其「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科技。①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發言中，曾根據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提出了反對霸權主義的主張。霸權（Hegemony）一詞雖首見於一九七二年的「上海公報」，其中公開表示：「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但是一九七四年四月，鄧小平更進一步把「霸權主義」引進到國際政治之中。從此以後，由於蘇聯在非洲採取擴張行動，在中東地區進行煽風點火，在西部亞洲一再策動政變，在東南亞則唆使共黨越南打倒了親中共的高棉波爾波特政權，這些都可以說是蘇聯全球戰略——打擊美國、包圍中共——的一環。

註① Chinese Objectives in South Asia: "Anti-Hegemony" VS. "Collective Security", Shirin Tahir-Kheli, Asian Survey, Oct, 1978, p. 998.

中共面臨蘇聯在全球，尤其是亞洲的擴張，採取了許多積極的措施，以資對抗，企圖形成一個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反霸統一戰線」來對抗中共所謂的蘇聯「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自鄧小平復出之後，中共不斷地派出高級代表訪問各國，在歐洲不僅企圖促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它共同對抗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同時還訪問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以分化共產世界內部的團結。在東南亞、東北亞、西南亞、中東和非洲等地區，中共也都不斷地加強外交攻勢，其中較令人注目的乃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巴基斯坦總理布托訪問北平時的聯合公報中表示：「雙方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世界任何地區建立霸權和勢力範圍的圖謀。」^② 如果說「上海公報」的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只限於亞太地區，那麼華國鋒和布托的「聯合公報」，已將反霸範圍由亞太地區擴大到印度洋地區。去年八月十二日，中共與日本簽訂「友好和平條約」，其中第二條加入了反霸條款；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和中共所發表的「建交公報」以及今年一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時與卡特所發表的「聯合新聞公報」中，也都出現了反霸字眼。後一公報稱：「雙方重申反對任何國家和國家集團謀求霸權或支配別國，決心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和民族獨立做出貢獻。」^③ 從此以後，反對「霸權主義」因上述二項公報的發表而賦予世界性的意義。也就是說，已由亞太印的共同反霸擴大到全球性的「反霸聯合戰線」。

此後，中共為了突破蘇聯的圍堵和包圍，在亞洲即以爭取印度，使其疏遠自一九七一年印蘇條約以來的密切關係為主要目標。^④ 一九七一年是中共和南亞各國關係最為暗淡的日子，那年八月蘇印簽訂「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雙方建立了特殊關係。該年年底，印度在蘇聯支持下出兵東巴，促成了孟加拉的建國。中共除了對蘇聯和印度不斷謾罵，並一再在聯合國阻撓孟加拉加入會外，無法有所作為。一九七五年孟加拉政變，親蘇印的拉曼政權被推翻後，中共感受來自南亞的威脅已略見緩和。一九七七年三月印度人民黨執政，新政府審慎地修正其外交政策，中共開始以談判邊界問題為餌，誘使印度疏遠其和蘇聯的關係，以減輕其在戰略上遭遇南北受敵的困境。今年二月十二日，印度外交部長瓦吉帕伊 (Atal Behari Vajpayee) 應中共「外長」黃華之邀訪問北平。這次訪問乃是一九六〇年四月，周恩來訪印以後，十八年來中共和印度恢復部長級會談的第一次，也可以說是中共和印度外交關係全面正常化的一個新的里程，其意義頗不尋常。至於雙方的邊界領土問題，恐怕還需要經過更高層的會晤才能解決，所以印度外長在訪問北平前夕，在一次對人民黨領袖和內閣部長的非正式會議上表示，這次訪問純屬試探性質，他將設法獲取雙方對世界問題的共同看法，如果雙方對各種問題能取得一致的諒解，那麼中共與印度的邊界問題就不難解決了。^⑤

註② 「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註③ 「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二日。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August 17, 1978.

註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9, 1979.

中共與印度關係的關鍵——邊界領土問題

我國和印度之間的邊界，東起中、印、緬未定界，西迄新疆、西藏、克什米爾及拉達克相交之處，其間夾着不丹、錫金和尼泊尔，原來會形成爲東、西兩段，但中共爲便於與印度爭論起見，將其分爲東段、中段和西段。東段包括自中緬印未定界起，向西直至不丹邊境的一段，全長約七百公里；中段包括自中國大陸西藏阿里地區和印度、尼泊尔交界處起，向西北方向伸延，直至阿里地區西端的突出部份，即磧穆綽克和約拉山口與拉達克交界處，全長約四百公里；西段包括自新疆與克什米爾北端相接處起，向東南伸延至空喀山口，再折向南部至西藏阿里地區西端突出部份，全長約七百公里。就整個中共與印度的邊界爭執而言，中段之爭遠不如東西段來得重要，因此一般談論邊界爭執都是指東段的麥克馬洪線以南地區和西段的阿克賽欽兩地而言。

麥克馬洪線爲一九一四年英國殖民當局和西藏地方政府秘密換文所產生的結果，當時的中國政府並未參與其事，討論的內容也未通知中國政府，所以中國歷任政府都不承認「麥線」爲中印的合法邊界。雖然如此，中印邊界各按傳統習慣處理，幾無爭執，雙方邊民也往來自如，甚少糾紛。尤其中印雙方從無敵意，雙方也無侵略擴張之野心，故縱有邊界觀點之分歧和主張，但均未駐兵於邊境，印度方面雖視「麥克馬洪線」爲其「合法國界」，亦未曾佔領線南地區，確屬歷來和平相處。惟當我軍撤出大陸時，印度曾乘機進據「麥克馬洪線」以南全部地區，並設置重兵駐防。從此，「麥線」由虛而實，成爲爾後中共與印度尖銳爭執問題之一。

中國大陸新疆省和克什米爾接壤的阿克賽欽地區，位於喀喇崑崙山脈和崑崙山脈之間，是一片人煙罕見，寒風刺骨的荒涼地帶，海拔約一萬七千英尺。自古以來是新疆省通往西藏的唯一商業通道，邊民在短促的夏季中午前後的幾個小時，待溪流中冰塊融化之際，人畜飽飲溪水之後，載着生絲、玉石、黃麥、食鹽、羊毛和毛牛的商隊通過這一地區。^⑥自十九世紀末葉，中國即提出阿克賽欽爲中國領土的主張，當時的英國也承認阿克賽欽部份在中國境內，一部份在英印境內。此後英國當局曾於一八九九年就阿克賽欽邊界問題向中國政府提出建議和照會，中國政府從未給予答覆。從此以後，英國未再提出要求中國同意的任何邊界線。因此，從阿富汗到尼泊尔這段邊界，始終未經劃定，所以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後，這段歷史上未定的邊界成爲中共與印度以及巴基斯坦與印度間的糾紛所在。^⑦

一九五四年印度出版的地圖把阿克賽欽劃成印度領土的一部份，但是在地面上並未實際加以佔領，也未實行其領土的管轄權，印度在拉達克最前方的哨所僅到達楚舒勒(Chushul)，距離阿克賽欽還非常遙遠，但中共却自一九五六年三月份起，以十九個

註⑥ India's China War, Neville Maxwell, Pantheon Books, New York, pp. 26-27.
註⑦ Ibid., pp. 35-36.

月的時間，修築了一條沿着新疆葉城穿越阿克賽欽地區的古代商路抵達西藏噶達克的戰略公路，全長約七百五十英里，其中大約有一百十二英里經過阿克賽欽，並曾在喀喇崑崙山口至空喀山口一線佈防，實行了有效佔領，而這時片面主張擁有阿克賽欽主權的印度竟然對中共的行動毫無所悉。所以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共和印度各自搶先佔領了自認在戰略上和實際考慮上對自己十分重要的地區。在東段，印度完成了英國人未竟的事業，貫徹了麥克馬洪線，不僅確立了行政管轄權，而且把這個地區更名為東北邊區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中共則在印度不知不覺的情形下，翻修了古代疆藏間的商路，並在阿克賽欽地區行使行政管轄。^⑧ 一九五八年印度獲悉中共已完成一條通過阿克賽欽的戰略公路時，曾於七月間從拉達克的列城 (Leh) 派出兩支巡邏隊調查公路的位置。到了十月間，一隊從公路南端拍回的電報證實了公路的存在，前往北部的一隊則失去蹤跡。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印度政府向北平提出了一份備忘錄，就印度發現的阿克賽欽公路作出了反應。這份備忘錄聲稱，這條公路所通過的領土為若干世紀以來就是印度拉達克的一部份，同時還詢問是否收到關於失蹤的巡邏隊的消息。中共在覆照中譴責印軍非法越境，進入中共的領土，因而已被扣留，但本著「中印友好的精神」，這批印軍已被遞解出境。自此以後，中共與印度終於因阿克賽欽領土爭執而發生了公開的衝突。^⑨ 此後尼赫魯和周恩來兩人一再發表公開函件，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張。一般來說，周恩來所主張的不外乎「雙方暫時保持現狀」，也就是說，中共願意就麥克馬洪線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以換取印度在阿克賽欽所屬問題上有所讓步。尼赫魯雖然同意了周恩來的主張，但是他運用詭辯術，從根本上把邊界問題弄得混淆不清。尼氏在答覆周恩來的建議時，一方面同意周恩來的主張；另一方面又提議「恢復原來的狀況而不是保持目前的狀況」，尼氏所要求的無非是要中共撤出阿克賽欽，後來尼氏的態度更為強硬，竟把這一立場作為舉行邊界談判的先決條件。^⑩

此後由於西藏抗暴運動發生，中共除對於印度駐藏人員大加敵視外，並公開攻擊印度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指責印度煽動及支持西藏的所謂「反叛」。印度朝野曾立即反唇相譏，並公開對藏胞之反共抗暴運動表示關切和同情。至此，中共與印度間之衝突已醞釀到沸點。到了達賴喇嘛率眾逃往印度，中共武裝部隊實行搜索和追擊，印度邊防部隊也奉命作緊急戒備，最後遂於一九五九年八月廿五日，在麥克馬洪線上的朗久暴發了中共與印度的第一次武裝衝突。此後不久，雙方又於同年十月廿日，在阿克賽欽的空喀山口爆發第二次流血事件。這兩次事件的發生對尼赫魯的尊嚴與威望無疑是個莫大的打擊。從此尼赫魯才暗自發現，印度和中共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很大，而且自信一旦戰爭發生，印度將可獲得勝利。

中共與印度之衝突公開化以後不久，中共曾突然改變態度，收斂其反印活動，並一再由周恩來照會尼赫魯，建議雙方各自從

註⑧ Ibid., pp. 87-89.

註⑨ Ibid., p. 95.

註⑩ Ibid., p. 102.

前線撤軍二十英里，然後再行商定日期及地點，舉行會談，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雙方爭執中的邊界問題。但周氏之建議，立即爲尼氏所拒絕，且被斥爲「不切實際」。後來經蘇聯非公開的斡旋，先由伏羅希洛夫訪問印度，爲中共說項，續由赫魯雪夫往晤尼赫魯，從中拉線，在幾往周折之後，印度方面才同意周恩來於一九六〇年四月赴新德里與尼赫魯進行會談。會談中，周恩來正式提出了解決邊界爭端的具體建議：「雙方相互接受東西兩段的現狀，並組織一個邊界委員會。」這就是意味着，中共在東段接受麥克馬洪線的走向，而印度則在西段接受當時實際存在的狀況。^⑭可是由於印度不讓步的立場，以致雙方雖經七次會談，並未作出任何諒解，也未就邊界問題達成任何協議。最後終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發生了邊界戰爭。

阿克賽欽爲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的障礙

自中共和印度邊界戰爭結束後，中共與印度邊界的東段，雙方仍以麥克馬洪線爲實際分界線。而西段阿克賽欽地區，中共的佔領區已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原來的實際控制線向前推進，根據印度的說法，邊界戰爭以前，中共大約佔領了印度所主張的阿克賽欽地區約一萬兩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戰爭期間，中共又進佔了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領土。^⑮這一片面積一萬四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土地，現在已成爲中共與印度關係全面正常化的癥結所在。

自印度人民黨於一九七七年三月執政以後，中共與印度在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中已有了新的突破，雙方已恢復了貿易、交通和文化交流等關係。但是邊界問題一直是雙方關係進一步改善的主要障礙。印度總理德賽和外長瓦吉帕伊都一再表示，只要中共繼續佔領印度克什米爾所屬拉達克的領土，印度不會採取任何主動來改善雙方的關係，而且認爲，印度已主動恢復和中共的大使級外交關係，下一個步驟應由北平採取主動。

中共「副總理」李先念在一九七七年九月接見一批美國新聞記者時，正式對外宣佈了中共和印度存有邊界領土糾紛。他說，中共與印度的邊界領土問題，在東段約有九萬方公里；中段二千方公里；西段三萬三千方公里。^⑯李先念之所以提出這些數字，其目的在向印度表示，要想解決領土問題，必須三段全面解決，並不是只談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其立場和一九六〇年周恩來的建議並無差別。所以當印度總理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記者訪問，提到「一九六二年戰爭的結果，我們的領土被中共佔領……」時，中共立即在一項海外英語廣播中宣稱，中共將盡一切力量來保衛中印邊界。^⑰中共的這一反應，顯然在向印度施加壓力。

註⑭ Ibid., p. 159.

註⑮ Guardian, July 11, 1977.

註⑯ "India-China Relations" (Documents), China Report, Sept.-Dec. 1978, p. 70.

註⑰ 見拙著「中共與印度關係的檢討與展望」，問題與研究，十七卷五期，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第四三頁。

一九七八年三月廿六日，中共「總理」華國鋒向第五屆人代會發表的工作報告中提到：「儘管中印之間存在着懸而未決的問題，只要雙方作出切實的努力，兩國關係是可以得到進一步改善的。」¹⁵接着中共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於三月七日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印度，這是中共與印度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後，派遣重要幹部到印度訪問的首次。當這一代代表團抵達機場時，受到「印度柯棣華大夫紀念委員會」(All-India Dr. Kothnis Memorial Committee)¹⁶為首的非官方代表的熱烈歡迎，機場上再度聽到了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印中兄弟友誼」的呼聲，大批尼赫魯大學的學生也在機場附近高喊「印中友誼萬歲」的口號。¹⁷由此可見印度各界對王炳南到訪寄以莫大的希望。王炳南於三月十一日和德賽總理會晤時，曾簡單地提到邊界糾紛，但並沒有加以討論，不過雙方同意通過談判解決邊界問題。¹⁸這也是中共與印度高級官員第一次一致承認雙方有邊界問題的存在。王炳南訪問期間，還代表中共「外長」黃華正式邀請印度外長訪問中國大陸。經由這一次王炳南的訪印，使中共與印度的關係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可是彼此對於對方的誠意仍然抱着懷疑的態度。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共「副總理」耿飴訪問巴基斯坦，參加中共援助巴國所建的喀喇崑崙崙戰略公路的通車典禮。這條公路乃是由新疆克什米爾巴屬克什米爾到巴國西北邊省的塔科特，全長約六百一十六公里，由塔科特可接通原有的公路直達克拉克港，其戰略意義顯然遠超過交通運輸目標，因此引起了印度的不安，認為這條公路的通車，已改變了南亞的戰略形勢，對印度構成了嚴重的後果。尤其是耿飴在通車典禮上公然表示：「支持巴基斯坦爭取克什米爾人民自決權」的主張，¹⁹更加引起印度的不滿。當時印度「外事秘書」梅塔(J. S. Mehta)曾召見中共駐印「大使」陳肇源，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並重聲克什米爾是印度的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²⁰印度國會要求其外交部長中止訪問北平的計劃，作為對中共的抗議。

一九七八年九月廿五日，印度總理公開表示，唯有中共向印度保證循友好途徑談判解決領土爭執問題，其外長訪問北平才有實際的意義。²¹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外長」黃華在聯合國總部約見印度外長瓦吉帕伊，這也是雙方外長十六年以來的第一次接觸。在會談中，雙方表示願意在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解決包括邊界問題在內的所有問題。²²印度外長於出席聯大歸國途

註¹⁵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三月七日。

註¹⁶ 柯棣華大夫為中日戰爭期間，印度援華醫療隊的一員，一九三八年至四三年間在延安醫院中工作。一九四二年加入共產黨，後來因積勞成疾而病逝延安，中共為了紀念這位友人，曾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在石家莊建有柯棣華大夫紀念館。

註¹⁷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rch 8, 1978.

註¹⁸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

註¹⁹ 「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八日。

註²⁰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June 29, 1978.

註²¹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Sept. 26, 1978.

註²²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Sept. 29, 1978.

，在倫敦告訴記者稱，中共會要求就邊界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②從這一消息的透露，我們可以發現中共對邊界問題的談判是較具彈性的，就過去中共和巴基斯坦、尼泊爾、緬甸等國的邊界條約來看，中共爲了討好鄰國，無不就實際地理的狀況，對自己所一向主張的邊界稍作讓步，而且中共目前急需爭取印度以對抗蘇聯的霸權主義和擴張政策，尤其是蘇聯和共黨越南簽訂友好條約後，中共在南部邊界方面亦受到威脅，整個中國大陸的邊界幾乎全部爲親蘇勢力所包圍。基於這種多面受敵的戰略劣勢，中共就邊界問題和印度妥協，乃是相當可能的。不過印度的立場似乎非常固執，頗有只允談判絕不妥協的氣勢。因此，印度外長訪問北平也只是一種試探性質。要想真正解決雙方的邊界問題，路途還非常遙遠，除非雙方都作出合理的讓步。

印度外長訪問北平打開了高層接觸之門

印度外長瓦吉帕伊原訂去年八月三十日訪問北平，可是當他於八月廿一日訪問尼泊爾歸國途中，突感腹部和脊椎疼痛而住院檢查，訪問北平之行的日程不得不往後順延，一直到十一月四日，印度政府宣佈，其外長因身體虛弱，不宜遠行，訪平之行延至一九七九年，確切日期需經雙方商議後再作決定。^③印度外長訪平的計劃，在國內曾經受到反對黨議員和部份人民黨議員的責難，尤其是喀喇崑崙戰路公路通車後，印度認爲對它的安全是一項嚴重的威脅，勢將改變南亞的戰略形勢，因此印度外長因病延期訪問大陸，外傳可能具有政治的因素，^④後來證實所謂「政治病」之說純屬虛構，瓦吉帕伊確因腸子黏連而接受治療。此後由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正值印度冬季國會會期，自然無法分身，元月份嚴寒的北平氣候，對大病初癒的印度外長也不盡適宜，所以決定於今年二月十二日訪問北平。在印度外長啓程前，德賽總理於訪問斯里蘭卡時曾作了如下的表示：「關係正常化要看他們（中共）的態度而定……我希望收回被佔的失土。我對中共政府的立場一貫都很明顯。我不主張使用武力，但是我希望和中共政府以談判和外交的方式，取得諒解。」^⑤黃華在印度外長抵達前夕，接受印度報界的訪問，就邊界問題所作的回答說：「我們採取朝前看的立場，並對此持樂觀的看法。」但是他承認，這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複雜問題」，而「目前雙方的看法並不一致」。然後他又說，邊界糾紛不應妨礙雙方關係的改善。^⑥

印度外長瓦吉帕伊和「外事秘書」梅塔一行七位高級官員，於二月十二日抵達北平，在機場受到中共「外長」黃華、「副外

註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October, 12, 1978.

註③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ember 5, 1978.

註④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November 3, 1978.

註⑤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12, 1979.

註⑥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

長」韓念龍和中共駐印「大使」陳肇源等的歡迎。黃華和瓦吉帕伊於十三日舉行首次會議後，在當晚的宴會上指出：「中國和印度兩國沒有理由不友好起來，儘管雙方之間存在着一些分歧，我們認為分歧可以討論，不應成爲發展兩國關係的障礙。」印度外長在致詞時指出：「我認爲，我們通過坦率交換意見，將能也必須作出有目的的努力，探索在我們關係中恢復相互信任的可能性。」^{②⑧}十四日，鄧小平在會見印度外長時說：「現在，我們要抓緊時間來改善我們兩國的關係。」同時又說：「邊界問題可以協商解決，求同存異，不應該阻礙其他方面的關係發展。」還說：「如果今天解決不了（邊界問題），可以留待明天解決。」瓦吉帕伊在回答時引用了一句印度成語說：「能够明天做的，今天便着手；能够今天做的，現在就立即進行。」二月十五日，黃華在和瓦吉帕伊結束第三次會談時表示：「會談增進了我們兩國的相互了解，有助於發展兩國的友好合作關係，雙方同意將繼續就有關問題保持接觸。」當天下午華國鋒會見瓦吉帕伊時說：「只要中印雙方都遵循和平共處五原則，我們之間的關係一定能發展得很好。我們在許多領域中發展合作的前景很廣闊。中國願意同印度發展友好合作關係。」^{②⑨}從這次印度外長訪問北平的整個經過來看，雙方都未就爭執中的邊界問題表示意見或提出建議，所談到的都是一般性的外交問題，由此可見，對於解決邊界問題，雙方的立場仍然無法一致，甚至於連求同存異的目標都無法達成。如果要指出這次訪問的成就時，恐怕只能說是打開了中共與印度高層接觸之門和黃華應瓦吉帕伊之邀將訪問印度，華國鋒也親自邀請德賽總理在適宜的時候訪問北平。二月十九日，中共「新華社」以「成功的訪問，良好的開端」爲題評述印度外長瓦吉帕伊訪問時說：「解決這個複雜問題（邊界糾紛），需要雙方的誠意和耐心，需要雙方本着實事求是，互諒互讓的精神。……除了通過和平協商的途徑，沒有別的办法。」^{③①}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

看出，中共與印度要想解決邊界糾紛，還需要經過一段漫長而緩慢的歷程。

瓦吉帕伊在北平的訪問結束後，立即前往上海和廣州訪問，此時中共突然分兵進攻共黨越南，進行其所謂「懲罰性」的戰爭，這對中共與印度的關係無疑蒙上了一層陰影。瓦吉帕伊在訪問行程尚未結束，即奉召匆匆兼程返國，俾就這次訪問和中共出兵越南事件向政府提出報告。共黨越南在最近一年來和印度的關係極爲友好，自從中共與共黨越南交惡後，印度已成爲非共國家中，援助共黨越南最多的國家之一，去年二月廿六日，雙方簽訂了一項由印度向它所提供的十億盧比（印度貨幣單位）的信用貸款^{③②}。今天中共突然出兵攻越，在印度人的心目中，顯然是中共已違反了所謂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諒解，因此，對中共與印度關係正常化，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

註②⑧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註②⑨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

註③①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

註③②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Feb. 27, 1978.